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

五四精神的解咒与重塑

海峡两岸纪念五四七十年论文集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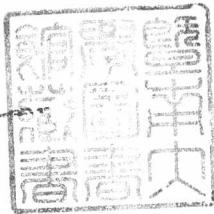
K261.17
2009/1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

孟子精神的解咒与重塑

海峡两岸纪念三四十周年论文集

臺灣學 生書局印行



港 台 书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五四精神的解咒與重塑：海峽兩岸紀念五四七十年論文集／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民81

面； 公分。
ISBN 957-15-0349-5 (精裝)。--ISBN 957-15-0350-9 (平裝)

1. 中國-文化-論文, 講詞等 I.

541.262

81001020

五四精神的解咒與重塑（全一冊）

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初版
香港總經銷：藝文圖書公司
地址：九龍偉業街九十九號連順大廈五樓及七字樓
電話：七九五五九〇〇〇元元
定價精裝新臺幣四四〇元
平裝新臺幣四六〇元
印 刷 所：淵明印刷廠
地 址：永和市成功路一段43巷五號
電 話：九二八七〇九五九五
郵政劃撥帳號：一四六五五號
記 證 字 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事業字第16668號
發 行 所：臺灣學生書局
主 編 者：淡江大學中文系
出 版 者：臺灣學生書局
發 行 人：丁文治

11909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349-5 (精裝)
ISBN 957-15-0350-9 (平裝)

「五四精神的解咒與重塑」序

自辛亥革命以來，五四運動一直是個「劃時代」的標幟。不論我們對近代史持何種看法，對五四運動本身如何評價，這個劃時代的歷史地位，沒有人能予以剝奪。

所謂劃時代，是暗示中國歷史經五四運動的衝擊之後，明顯地可以區分成兩個段落，有些人認為：在此之前的中國，是封建、迷信、帝制的中世紀；五四以後的中國，才找到理性的光，引進了民主與科學，才進入現代化的歷程，走出封閉保守的世界，參與東西文化融合之大業。有些人則認為五四之前的中國文化，自成體系，價值獨具；五四扇鼓狂飆，以致邪說橫行，棄置傳統文化於不顧，黃鍾毀棄，瓦釜雷鳴，故國族淪胥，流毒迄今。這些迥然不同的價值判斷，都顯示了五四運動那不可忽視的地位。歷史固然是延續的，五四運動也不可能與傳統文化無所繫聯，但總體來看，五四運動確實是帶來了中國文化從表達形式到文化內涵的變遷。這些變遷，深刻影響著中國近代史的各個細部環結。因此，活在這個時代中的人，除非對文化問題、對中國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處境，毫無感受或無所思考，否則他便不能不從五四開始談起。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在臺灣，一方面有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五四人物，繼續堅持五四的理想，顯示五四的人格典型；一方面有號稱「後五四人物」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義的思潮與精神，繩武相繼，波瀾亦漸趨壯闊；而反對與批判五四者，如新儒家之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錢穆等，也開展了不可忽視的文化力量。自六〇年代的「中西文化論戰」以來，彼此相激相盪，對中國文化的

內涵，以及中國文化如何現代化之道，提供了深刻的探討。時至今日，固然臺灣新一代的知識份子已不再視五四為近代文化的啓蒙圖騰，對於長期的五四崇拜，亦已漸感煩厭。然而，做為文化思考的起點之一，五四運動仍具有其價值與魅力。只不過，回歸五四既無必要，新的歷史問題，就是如何開創新五四了。

大陸地區，情況與臺灣甚為不同。中國共產黨向來以五四運動的繼承人自居，但其所推崇者，為李大釗、為魯迅。他們認為五四運動的價值，主要是因為引進了科學的馬克斯主義。故於五〇年代發起了大規模的批判胡適運動，對於從鴉片戰爭到五四、五四到「新中國」建立之歷史，亦有一套特定的解釋方式。這種歷史觀，歷經文化大革命之後，產生了深刻的反省，因此，在所謂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最重要的思想指標，就是對五四精神之再認識。「回到五四」成為新時期啓蒙的重要號召，相關著作及言論，不知凡幾。

這兩種不同的發展，大略可以說臺灣是在超越與揚棄五四，以開展新的文化運動，創造新的五四；大陸則是由回歸與發揚五四，來展開新的文化啓蒙。四十年來不同的歷史，形成了對應五四不同的態度。這其中不能說誰高誰低、誰對誰錯，由於歷史與社會不同，五四對我們的意義也不會一樣。而所謂「五四」，正應經由這番曲折與分歧的詮釋，方能透顯它的豐富蘊涵與歷史價值，故臺灣與大陸對五四的態度，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這本論文集，最能表現這種相輔相成之意義。

這本論集，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四日，由淡江大學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合辦的「海峽兩岸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結集而成。該次會議，不僅為海峽兩岸高等學府第一次合作舉辦之研討會，亦為四十年來兩岸知識份子第一次針對五四運動的討論，象徵意義之高，固然不言

可喻，實質上的討論，亦彌足珍貴。

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四日，是五四七十周年，也是大陸學生重提五四精神、發起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之日。從四月初紀念胡耀邦，發展到五四，民主與自由的呼聲，與七十年前遙相應和，且更為激昂嘹亮。在這個時候，本校教師們站在北大、站在天安門廣場上，談著五四，看著新的五四，歷史的追思、時代的激情，想必是一齊噴湧而至，令人難以忘懷的。因此，這似乎也不只是一本論文集，而更是一冊歷史的證詞，它見證了那個激昂慷慨的時代，也再度揭示了五四運動的意義。

我個人雖因職務所繫，無法親自參與這次研討會，但對於能推動這項活動，我仍然感到欣慰與驕傲，對於本論文集之出版，也格外關切。為自七十八年五月四日舉辦研討會以來，由於新五四運動立刻發展為波瀾壯闊的民主浪潮，而遭到強力鎮壓，「六四事件」使得論述文化之環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曾經參與討論者，亦或遠走海外。輾轉聯繫，迭生波折，故這本論文集拖延迄今，方得編訂完成。茲值論集付梓，謹綴數語，略申感慨，並藉此感謝曾與我們合作的北京大學哲學系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諸執事先生，是為序。

張建邦 中華民國八十年八月

五四精神的解咒與重塑 目 錄

甲 編

「五四精神的解咒與重塑」序

張建邦

晚清·五四「白話文」理論的源頭

李瑞騰

新文化運動反映下的文學史寫作

——劉大杰以民間文學為主流觀點的檢討

王文進 ······ 一七

晚清思想的批判意識對五四反傳統思想的影響

——以譚嗣同的變法思想為例

王 橋 ······ 二九

傳統與反傳統

——以章太炎為線索，論晚清到五四的文化變遷

樊鵬程 ······ 九八

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歷史觀點

王明蓀 ······ 一三五

傳統與反傳統

——一個形上學的反省 ······ 高柏園 ······ 一四九

中國「五四」與西班牙「九八年代」文學運動之分析比較 ······ 熊建成 ······ 一五九

跨文化思想研究

——梭羅與莊子比較初探 ······ 陳長房 ······ 一六六

乙編

簡論五四運動

····· 肖萬源 ······ 一七四

「五四」的時代課題及其啓示

····· 徐達和 ······ 一八九

繼承「五四」、超越「五四」

····· 羊蓀生 ······ 二〇四

淺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局限性

····· 馮增銓 ······ 二二三

「五四」的開放精神和中國的文化建設

····· 谷方 ······ 二三四

從宏觀考察五四運動

····· 周桂鈿 ······ 二五一

文化發展中的連續與變革 ······

陳來 ······ 二六四

儒學與五四運動 ······

馬振鋒 ······ 二七八

科學、民主與傳統道德 ······

蒙培元 ······ 二九三

論五四運動與中外文化交融 ······

王曉秋 ······ 三〇六

「五四」東西文化爭論斷想 ······

傅雲龍 ······ 三一〇

東西文化差異的本質與根源 ······

張利民 ······ 三三一

五四運動與西方邏輯在中國的傳入和傳播 ······

周雲之 ······ 三四四

試析「五四」與中國近代價值觀的變革 ······

丁楨彥 ······ 三五八

理智的了解與情感的滿足 ······

陳慶坤 ······ 三七一

「五四」時期的唯物史觀 ······

于良華 ······ 三八三

「五四」時期思維方式的變革

鄭柏林 ······ 三九三

五四運動與中國現代哲學

徐素華 ······ 四〇八

「五四」以來的新儒家與中國哲學現代化

宋志明 ······ 四一九

中國的傳統、西化與現代化

王樹人 ······ 四三二

論傳統文化

樓宇烈 ······ 四四六

反傳統與文化心理惰性

孫玉石 ······ 四五七

對反傳統思潮的一點反思

錢遜 ······ 四七四

改革與傳統文化模式的轉換

張文儒 ······ 四八二

簡論陳獨秀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批判

許金興 ······ 四九五

胡適的治學方法

孔繁 ······ 五一〇

梁啟超與五四運動.....

劉邦富.....五二〇

楊昌濟的中西文化觀.....

王興國.....五三四

編後記.....

五四七

甲 編

晚清·五四「白話文」理論的源頭

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李瑞騰

一、前言

「改良」或者「革命」是歷史的傳承與創新過程中的手段或方式。在政治的層面，代表一種權力的對抗與衝突，可能會有殘酷的血腥戰鬥；在文化的層面，對抗與衝突的則是思想和觀念，往往是知識份子的一種醒覺運動，極其珍貴，不斷被後來的人去探索與研究。

任何一個運動都有各種內外與遠近成因，有的顯而易見，有的隱秘難尋，探索者必須傾全力在資料中去發現，而事實上許多探源工作都不夠徹底，觀其瀰而不能索其源，振其葉而無法尋其根，令人遺憾。

五四階段的新文學運動風起雲湧，白話文終成書寫的主流媒介，胡適說是「改良」（文學改良倡議）、陳獨秀說是「革命」（文學革命論），事實上這兩個名詞在晚清就已頻頻出現，而且已經用在語文上面了，像「詩界革命」，像「戲曲改良」，當然在晚清和在五四，革命或改良有其性質和程度上的不同，不過二者之間關係密切是不容置疑的。

就歷史的發展來說，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已經到了開花結果的階段，種苗則是在晚清播下的，單說是胡適等人如何如何，正如同說唐代的古文運動只在韓愈、柳宗元一樣，難免受到執一隅之解以擬萬

端之變的譏嘲。換句話說，晚清之際，語文已在運動，「白話」這個詞已普遍被運用，而且已相當流行。

我們可以這麼說，晚清白話文從興起到蔚然成爲一種運動乃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今人侯健說：國族的危機，使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人物，感覺拯救的努力，刻不容緩。在這最大的原因下，他們有了兩種主張和實際的反應。第一，對外他們希望能夠通洋務，因而要派遣留學生；第二，對內他們希望喚醒民心，因而在改革文字，倡導白話運動，使凡識字的國民，都能瞭解世界國家大事，擔負起救亡圖存的責任。^①

同時他提及「王照、勞乃宣等倡白話，創字母，更屬（五四）白話運動的先驅」^②，這種見解是對的。一般新文學史家在論及「文學革命」的「背景」或「成因」時，也曾經略述晚清的白話文理論對於五四階段新文學運動的影響^③。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者像王爾敏，則把晚清的這種白話文運動視爲清季知識份子自覺性反省所產生的新動向，而其本身的「知識內容」入於「文學領域」者^④；另外王氏亦曾撰長文討論白話的運用對於當時通俗文學之興起以及知識普及彼此間互動的關係^⑤。於此，筆者擬對晚清的白話文作一整合性的敘說，並綜合各家之說，討論其理論本身，並指出其內蘊思想。

二、白話文的基本思想

晚清白話文的出現，乃是相抗於中國士大夫書寫用的整個古文系統（在當時特指桐城派的古文），所謂的「白話」，首先我們必須瞭解，它並非是一個一成不變的詞彙。易言之，某個時間階段可能

會有當時人所使用的白話，而此時與彼時，此地與彼地亦並非是判然二分的。

民國初年，胡適爲了替他所鼓吹的改良文學尋找理論根據，遂放大「白話文學」的範圍，而爲「白話」做了這樣的解釋：

一是舞台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⁶⁾

這當然是爲了準確而周全地解釋「白話」所做的一番說詞，其實所謂「白話」，即是通行於民間的日常用語，嘴巴怎麼說，筆下就怎麼寫，寫出來的文字就是「白話文」。晚清之際，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以後，由於國族日漸加深的危機，造成知識界普遍的自覺運動，一些知識份子體會出要救亡圖存（不論是維新派或是革命派），必須要讓新思想普遍深入社會大衆的意識之中，而知識要能普及化，首先表達媒介便必須具有淺顯易懂的通俗性格，而傳統知識界書寫用的古文相當典雅，一般庶民大衆無法閱讀，所以比較困難擔負起傳播新思想的重責大任，在窮則變的情況下，終於有人開始徹底檢討語言和文字的存在之問題了。

遠在光緒之初，黃遵憲在《日本國志》⁽⁷⁾中即已暢論語言與文字之離合，有所謂「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⁸⁾，對於中國文字，他認爲字體有趣於簡便之可能，字數有孳生之可能，而文字組成篇章，他說：

周秦以下，文體屢變，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諭批判，明白曉暢，務期達意，其文體絕為古人所無。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於書者，則語言文字，幾復合矣，余又烏知他日者，不更變一文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⁹⁾

黃遵憲「明白曉暢，務期達意」、「適用於今、通行於俗」的文體之要求，何異前引胡適之於《

白話文學史》中所界定的「白話」。後來在光緒二八年（一九〇二），他在讀過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名學》之後，於《致嚴復書》中論著譯之事，關於《名學》一書，他說：「苟欲以通俗之文，闡正名之義，誠不足以發揮其蘊。」至於《原富》之篇，他說：「或者以流暢銳達之筆爲之，能使人同喻，亦未可定。」同時因為翻譯一事可以「通彼我之懷，闡新舊之學」，所以他大膽提出「造新字」與「變文體」的《文界維新論》^⑩。

在《日本國志》中，黃遵憲已有反古文傾向，甲午戰後第二年（一八九五）五月，萬國公報刊出以英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具名的徵「時新小說」啓事^⑪，言及中華三大積弊乃是：鴉片、時文、纏足，所謂「時文」即「八股文」，在徵選原則上，要求「辭句以淺明爲要，語意以趣雅爲宗，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⑫。

此二家之言，原只是鼓吹文章的辭句要淺顯易懂以便傳達，基本上已是一種文章工具改革的論調，當然是時代潮流使然，在往後的三、四年之間遂發展成爲白話文的理論，並且有相當廣泛的推行。

王爾敏先生認爲：白話文之濫觴，以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成立「蒙學會」與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成立之「白話學會」爲重要里程碑^⑬。前者是由無錫人裘廷梁（字保梁，號可桴）提議，上海「時務報」主持人汪康年邀集葉瀾、汪鍾霖、曾廣銓四人所創立，並在「時務報」之外另辦「文義淺顯」的「蒙學報」，鼓吹童蒙教育要改弦更張：「取淺明通變之法，切實易能之書，教之有道，輔之有序」^⑭；後者乃裘廷梁約集同道顧述之、汪贊卿、丁福保等人在無錫所創辦，同時刊行「無錫白話報」（旋改爲「中國官音白話報」），提倡白話文，將白話與維新運動結合起來，裘氏且發表「論白話爲維新之本」^⑮，揭橥「崇白話而廢文言」的鮮明旗幟。

裘氏在這篇白話宣言裏，主要在談文言之害與白話之益，結論所謂「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

天下之具，莫白話若」，「文言興而後實學廢，白話行而後實學興」，頗能說明他的觀點，至於全篇內容，約略可做如下的歸納：

(一)智民之多少實關係著國之盛衰。

(二)中國人民之所以不智乃是文言之害，因爲語言與文字判然爲二。

(三)白話有八益：省日力、除憤氣、免枉讀、保聖教、便幼學、鍊心力、少棄才、便貧民。

四中國古時用白話，泰西與日本用白話，皆各有其效。

裘氏反對的是以文言做爲表達媒介，他並不反傳統，所以他主張將古書「譯以白話」，八益中所謂「保聖教」，便是指這一件事情。以今日的立場來看，我們或許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論點，尤其是文言之害，極其誇張，但是在那樣的一個時代，非常時期要有非常手法，改革文字正是其中之一。

和裘廷梁大約同時，陳榮袞（字子褒）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寫了一篇〈俗話說〉^⑯，於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發表了一篇〈論報章宜用淺說〉^⑰。在前文中，陳氏提出雅俗二元對立的語言論，他說：「人人共曉之話謂之俗，人人不曉之話謂之雅，十得二者亦謂之雅。今日所謂極雅之話，在古人當時俱俗話也，今日所謂極俗之話，在千百年之後又謂之雅也。」這裏的所謂「雅」有其特殊指涉，亦即後文所說的「文言」，而「文言之禍亡中國」，理由很簡單，因爲能文言者少之又少，故民智不開，其時正是變法呼聲高張之後，陳氏的文字改革論遂與政治合而爲一，他說：「大抵變法，以開民智爲先，開民智莫如改革文言」，如何改法，他主張改爲淺說，以淺說去輸入文明。陳氏可說是近代第一位主張報章宜用淺說（白話）之人。

黃遵憲、裘廷梁和陳榮袞皆維新運動人物，有「白話」和「淺說」的認識自是理想當然。而革命派的章炳麟和劉師培，一方面從事國故、國粹的探索、整理，另外一方面也瞭解到思想普及的重要性，

譬如章氏就認為「文字本以代言」⁽¹⁹⁾、「語言文字出於一本」⁽²⁰⁾，主張方言亦合於文，而思賦予新的生命而作「新方言」⁽²¹⁾，而劉師培更進一步指出「宋代以下，文詞益淺，而儒家語錄以興；元代以來，復盛興詞曲，此皆語言文字合一之漸也，故小說之體即由是而興，而水滸傳、三國演義，已開俗語入文之漸」⁽²²⁾，由於看出這種發展趨向，而且能夠用嚴肅的態度去面對，從實用的立場，為達「覺民」，所以要以「通俗之文推行書報」，所謂「修俗語以啓滄齊民」即是。不過，劉氏終究是一古文學家，一國粹運動家，所以要「用古文以保存國學」，對他來說，古文與俗語是並行不悖的，這種二元論主張亦頗為實際，在過渡時代，未嘗不是一條可行之路。

語言、文字是人與人之間賴以溝通的媒介，知識份子更以它為傳播思想的工具，晚清的政治家、思想家為了「開民智」，崇白話而廢文言，或者主張古文與俗語分途運用，基本上是有其政治和社會功能的考慮，我們雖不一定認同他們的見解，但是有必要用一種比較寬容的態度去面對這些言論，尤其要注意，五四人物像胡適之的白話文思想絕對可以在晚清找到其思想源頭。

三、白話報的出現

當白話文被如此談論之時，我們幾可斷言，那已可稱之為運動——一種語言和文字的醒覺運動。然而，有理論必要有實踐，否則實難成為氣候，於是我們發現白話文被大量運用，最明顯的是白話報紙的出現。

根據張玉法所編製《近代中國書報錄》（一八一一一九一三）的記錄⁽²³⁾，報名冠以白話（或相近語詞）者如下：